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to
Promote Inclusive Growth

促进共享式增长的 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 肖翔 著

促进共享式增长的 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Fiscal Expenditure Policy to Promote Inclusive Growth

肖翔 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责任编辑：黄海清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陈晓川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促进共享式增长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Cujin Gongxiangshi Zengzhang de Caizheng Zhichu Zhengce Yanjiu）/肖翔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049-8540-8

I. ①促… II. ①肖… III. ①财政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F8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4233号

出版

发行

中国金融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2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63805472，63439533（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63365686（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毫米×239毫米

印张 10.5

字数 180千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ISBN 978-7-5049-8540-8/F.8100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010）63263947

前 言

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并且增长成果能否为民众所共享，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一些可能威胁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现象值得注意，包括：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有所减弱；收入不平等高位徘徊，非收入维度不平等有所加剧；政府再分配效果有待加强。以上现象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未公平地惠及所有人，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相违背。不仅如此，解决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问题，还关系着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如何使更广泛的民众更公平地共享经济增长成果，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针对上述发展问题，理论界和政策界提出了共享式增长的解决方案。共享式增长是强调经济增长成果由更广范围的民众所共享的经济增长方式，既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也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共享式增长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同步提升居民平均收入，并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从而最大程度提升社会福利。

理论和实践表明，由于兼具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财政支出政策在实现共享式增长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鉴于此，笔者以财政支出如何影响共享式增长为主题，全面梳理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基于阿玛蒂亚·森提出的社会福利指数和脱钩指数方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共享式增长指数（IGI指数），利用1978—2014年的全国数据和1995—2013年的省级数据，计算出全国共享式增长指数和省域共享式增长指数，详细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共享程度的时序变化和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机制、作用方向和区域差异，得出

以下主要研究结论：

(1) 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不会自动出现，共享式增长并非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实现共享式增长，需要政府实施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支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2) 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主要有两个影响机制：即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不同类别财政支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作用机理和影响程度具有一定差异，对共享式增长的综合影响也不一样。公共投资支出、经济事务支出等经济性支出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较为直接的增长效应，但也会通过归宿于不同地区或群体，产生一定的分配效应。公共教育支出、公共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社会性支出的主要目标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具有较为直接的分配效应，但也会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可行能力，产生一定的增长效应。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特征。改革开放早期，经济增长具有高度共享特征，基尼系数较低，人均GDP和社会福利迅速提高；之后进入中低共享程度的经济增长阶段，基尼系数逐年攀升，经济增长尽管比第一阶段更快，但收入分配的恶化，部分抵消了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增量；2008年后，经济增长开始由中度共享转向高度共享，这得益于在维持较高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同时，基尼系数逐年下降，使社会福利有了较大幅度提升。

(4) 1996年以来，我国省域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共享特征，但在具体表现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1996—2013年的共享式增长指数均值看，多数样本省份的经济增长具有中度共享，实现高度共享的只有北京、上海和浙江这3个省份。从共享式增长指数的具体数值看，多数样本省份实现中度共享和低度共享的年份要多于实现高度共享的年份，只有北京实现高度共享的年份比例超过60%。

(5) 对我国财政支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支出整体上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但并没有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公共教育支出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作用，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时滞较长；公共卫生支出在短期内能够提高经济增长同时降低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没有产生显著作用；公共投资支出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并对收入分配起到了微弱的、短期的改善作用；经济事务支出对经济增长

无显著影响，对收入分配有不显著的改善作用；国防和公共安全支出为代表的一般性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会恶化收入不平等。

（6）对我国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实证结果显示：公共教育支出对共享式增长具有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公共卫生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作用也十分显著，但其作用的持续时间要短于公共教育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公共投资支出、经济事务支出和以国防、公共安全支出为代表的一般性支出对共享式增长没有显著作用。在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公共卫生支出在发达地区对共享式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非发达地区对共享式增长没有显著作用；相比于发达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在非发达地区的共享式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且更持续。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背景	1
1.1.2 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	8
1.2 技术路线、研究方法 with 结构安排	14
1.3 主要概念界定	17
1.3.1 共享式增长	17
1.3.2 财政支出及其分类	18
1.4 创新与不足	20
第2章 文献综述	22
2.1 共享式增长相关研究	22
2.1.1 共享式增长的概念	23
2.1.2 共享式增长的重要性	26
2.1.3 共享式增长的测度与比较	28
2.2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	34
2.2.1 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34
2.2.2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35
2.3 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相关研究	37
2.3.1 财政支出对增长、不平等的影响	37
2.3.2 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	44
2.4 本章小结	47

第3章 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	50
3.1 理论模型：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50
3.2 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总体分析	54
3.3 影响机制之一：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	57
3.4 影响机制之二：财政支出的分配效应	61
3.5 本章小结	64
第4章 我国财政支出与共享式增长的现状分析	66
4.1 我国财政支出的现状分析	66
4.1.1 我国财政支出总量分析	66
4.1.2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69
4.2 我国共享式增长的现状分析	75
4.2.1 共享式增长指数构建	75
4.2.2 我国总体共享式增长指数分析	80
4.2.3 我国省域共享式增长指数分析	84
4.3 本章小结	88
第5章 我国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实证分析	90
5.1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90
5.1.1 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介绍与模型设定	90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92
5.2 财政支出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95
5.2.1 数据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95
5.2.2 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96
5.2.3 脉冲响应分析	96
5.2.4 关于财政支出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的进一步讨论	102
5.3 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综合影响分析	104
5.3.1 数据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104
5.3.2 滞后阶数选择与模型稳定性检验	105

5.3.3 脉冲响应分析·····	105
5.3.4 关于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进一步讨论·····	107
5.4 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	109
5.4.1 数据统计性描述与平稳性检验·····	109
5.4.2 滞后阶数选择与模型稳定性检验·····	110
5.4.3 脉冲响应分析·····	111
5.4.4 关于财政支出影响共享式增长区域差异的进一步讨论·····	112
5.5 本章小结 ·····	113
 第6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114
6.1 研究结论 ·····	114
6.2 政策建议 ·····	115
6.2.1 适当提高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扩大共享式增长的财政资源 ·····	116
6.2.2 提高公共教育和卫生支出比重, 注重社会保障支出归宿精准性··	116
6.2.3 提高公共投资和经济事务支出效率, 减少冗余的一般性支出·····	117
6.2.4 协同推进税收、普惠金融、就业等其他必要的政策措施·····	118
6.3 研究展望 ·····	118
 附 录 ·····	 122
参考文献 ·····	141
后 记 ·····	155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背景

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并且增长成果能否为民众所共享，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1978—2014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达到9.76%，名义GDP从1978年的3645.2亿元迅速升至2014年的636138.7亿元；人均GDP年平均增速达到8.68%，名义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2元提高到2014年的46629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从低收入组国家跃升为中高收入组国家。

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极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4元升至2014年的293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升至2014年的10488.9元。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7.5%和57.8%下降到2013年的35.0%和37.7%。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12月发布的最新《人类发展报告》，我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得分为0.727，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①。1980年以来的三个十年里，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普遍高于按不同人类发展水平分组的各组平均水平。

^① 人类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低人类发展水平： $HDI < 0.550$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0.550 \leq HDI \leq 0.699$ ；高人类发展水平： $0.700 \leq HDI \leq 0.799$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HDI \geq 0.800$ 。

表1.1 我国1980—2014年人类发展指数

分组	HDI数值					HDI年变化率(%)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14年	1980—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13年
中国	0.423	0.502	0.591	0.682	0.727	1.72	1.66	1.52
极高水平	0.757	0.798	0.849	0.885	0.896	0.52	0.62	0.37
高水平	0.534	0.593	0.643	0.723	0.744	1.04	0.81	1.04
中等水平	0.420	0.474	0.528	0.601	0.630	1.22	1.09	1.17
低水平	0.345	0.367	0.403	0.479	0.505	0.64	0.95	1.56

资料来源：根据《人类发展报告》整理。

同时，我国在减少贫困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30多年来，我国共有6亿多人摆脱贫困。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按照1.25美元/天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我国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84.27%下降到2011年的6.26%；按照2美元/天的标准，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97.85%下降至2011年的18.61%。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为2014年的7.2%。

表1.2 我国1981—2011年贫困率 单位：%

贫困指标	1981年	1987年	1990年	1996年	2002年	2008年	2011年
1.25美元/天	84.27	53.95	60.73	37.39	28.06	12.34	6.26
2美元/天	97.85	83.63	84.97	66.2	50.73	28.33	18.6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在经济增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可能威胁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有所减弱。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评估报告》测算了1981—2005年我国贫困发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弹性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2.52下降到了2002年至2005年期间的1.03，贫困对增长的反应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40.9%，这表明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有所下降。该报告还提出收入不平等的快速上升是导致贫困对增长反应下降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对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治理，就难以保持较高的减贫率。Balakrishnan、Steinberg和Syed（2013）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益贫的，但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部分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那样具有共享特征。

二是收入不平等高位徘徊，非收入维度不平等有所加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已经进入一个高位徘徊阶段（王天夫和王丰，2013）。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经历了两个阶段，从2003年的0.479持续上升至2008年的0.491，从2008年之后逐步回落至2013年的0.473。但这一测算结果引起了较大争议，一些民间机构测算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国家统计局数据。比如，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61。Xie和Zhou（2014）研究表明，2005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呈持续走高趋势，数值在0.53~0.61。也有学者（岳希明、李实，2013）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基本上是可接受的，但同时也存在数据收集、估计方法上的问题。尽管各方数据有着较大差异，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仍然维持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以上。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高位，我国在人类发展的非收入领域不平等状况也有所加剧。《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在健康、教育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等，导致人类发展指数经不平等调整后产生了22.3%的损失。世界银行（2013）也认为，我国在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务上存在较为严重不平等。

表1.3 我国经不平等调整后的人类发展指数

时间	HDI	不平等调整后的HDI			不平等调整的健 康指数		不平等调整的教 育指数		不平等调整的收 入指数	
	值	值	损失 (%)	位次 变化	值	损失 (%)	值	损失 (%)	值	损失 (%)
2011年	0.687	0.534	22.3	-1	0.730	13.5	0.478	23.2	0.436	29.5
2012年	0.699	0.543	22.4	0	0.731	13.5	0.481	23.2	0.455	29.5
2013年	0.719	—	—	—	0.768	—	—	—	0.505	—
2014年	0.727	—	—	—	0.774	—	—	—	0.514	—

资料来源：根据《人类发展报告》整理。

三是再分配效果有待进一步加强。一般认为，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政策能够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我国，政府再分配的工具、范围和效果都有待加强。首先，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总体规模较低，限制了再分配的作用空间（Il Houng Lee等，2013）。其次，我国目前的税收体系以间接税为主体，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占比不高，影响

了税收再分配效应的发挥（米增渝，2012）。最后，公共财政资源的不平衡配置转化成公共服务水平、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续扩大（世界银行，2009）。此外，有学者（周业安等，2012；王天夫，2013）认为，我国的再分配政策存在三种逆向转移，即城乡逆向转移、区域逆向转移、不同群体间的逆向转移，城市、东部地区、富人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转移支付，导致收入不平等进一步拉大。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直观地给出了再分配前的基尼系数和再分配后的基尼系数^①。1970年以来，我国的政府再分配作用十分薄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甚至产生了-0.02的负效应，这样的再分配效果不仅与发达国家（如七国集团的成员国）有很大的距离，即使与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相比，也处于落后位置。

综上，尽管我国在经济增长、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减少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持续高位，经济增长成果并未公平地惠及所有人。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如何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条件下，尤其是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下，使更广泛的民众更公平地共享经济增长成果，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正是意识到经济增长成果共享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战略任务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预期目标（即“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明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表1.4 再分配效果的时序与国际比较

时间	比较维度	中国	二十国集团	七国集团	新兴十一国	金砖国家
1970—1979	净不平等	0.30	0.36	0.30	0.43	0.46
	市场不平等	0.30	0.44	0.41	0.47	0.50
	再分配效果	0.00	0.08	0.11	0.04	0.04

^① 需要指出的是，SWIID数据库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呈持续恶化状态，这一判断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相背离（也与笔者估算的结果不一致），这里列出SWIID数据，只是想更加直观地描述再分配效果（即市场不平等减去净不平等）的国际差异。

续表

时间	比较维度	中国	二十国集团	七国集团	新兴十一国	金砖国家
1980—1989	净不平等	0.29	0.36	0.29	0.42	0.44
	市场不平等	0.30	0.43	0.42	0.45	0.48
	再分配效果	0.01	0.09	0.13	0.03	0.04
1990—1999	净不平等	0.37	0.38	0.31	0.44	0.49
	市场不平等	0.38	0.47	0.46	0.48	0.54
	再分配效果	0.01	0.09	0.15	0.04	0.05
2000—2007	净不平等	0.50	0.38	0.32	0.44	0.50
	市场不平等	0.49	0.48	0.48	0.48	0.55
	再分配效果	-0.01	0.10	0.16	0.04	0.05
2008—2013	净不平等	0.54	0.38	0.32	0.43	0.49
	市场不平等	0.52	0.49	0.49	0.48	0.56
	再分配效果	-0.02	0.11	0.17	0.05	0.07

注：二十国集团的数据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英国、美国等17个经济体数据的平均值。七国集团的数据包括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美国等7个经济体数据的平均值。新兴十一国数据包括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土耳其等9个新兴经济体数据的平均值。金砖国家数据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4个经济体数据的平均值。为便于中国与以上组别国家的比较，计算以上组别平均值时，已剔除中国数据。SWIID数据库没有沙特阿拉伯数据，因此，所属的相应组别数据不含沙特阿拉伯数据。本表数据的时间跨度如下：阿根廷：1970—1972、1974—2013。澳大利亚：1970—2012。巴西：1974、1979、1981—2012。加拿大：1970—2011。中国：1970、1972、1974、1975、1978—2013。法国：1970—2012。德国：1970—2012。印度：1970—2010。印度尼西亚：1970—2013。意大利：1970—2013。日本：1970—2010。韩国：1970—2013。墨西哥：1970—2012。俄罗斯：1970—2011。南非：1970、1972—2011。土耳其：1977—2012。英国：1970—2013。美国：1970—2012。

资料来源：根据SWIID，即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Version5.0整理，该数据库于2014年10月最近一次更新。

解决经济增长成果共享问题，不仅关乎人民福祉的提升，还影响着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国际经验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过大，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试图跻身高收入国家失败的14个国家，在1965年之前的基尼系数高达0.498，而挑战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则不到0.4（贺大兴等，2014）。根据宾州大学列出的112个国家1980—2009年的收入转移矩阵，1980年的15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有11个到2009年仍然属于低收入行列，

在1980年的46个中低收入国家和25个中高收入国家中，到2009年分别有34个和17个国家的分组并没有发生变化。对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大多是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因此，有学者（王天夫，2013；Narayan等，2014）总结，在所有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高度不平等不仅是其共同特征，也是其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的情况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表1.5 世界收入转移矩阵：1980—2009年

收入分组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高收入	高收入	合计
低收入	11	4	0	0	15
中低收入	12	22	12	0	46
中高收入	0	2	15	8	25
高收入	0	0	0	26	26
合计	23	28	27	34	112

注：收入分组为世界银行的分类。

资料来源：宾州大学世界表6.0，转引自：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针对上述发展问题，理论界和政策界都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共享式增长（Inclusive growth，也译为包容性增长^①）是其中较为主流的方案。共享式增长是强调经济增长成果由更广范围的民众共享的经济增长方式，既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可持续性，也关注经济增长成果共享，从更为直观的角度看，共享式增长就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同步提升居民平均收入，并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从而最大程度提升社会福利。实际上，我国改革开放早期是典型的共享式增长（郑永年，2010；徐俊武，2013），改革最早从农民这个社会最弱势群体开始，农副产品价格的提高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产量上升，大大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总的来说，改革开放早期在分配领域打破了固化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在经济领域允许国有企业部门之外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部门，使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分享到了经济

^① 关于Inclusive growth的翻译，部分学者（林毅夫等，2008；卢现祥等，2012）译为共享式增长，部分学者（蔡荣鑫，2009；徐俊武，2013）译为包容性增长，笔者认为共享式增长更加契合共享发展理念，更能体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求，因此倾向于第一种译法。同时，在本文中不对共享式增长和包容性增长刻意区分。

增长的成果。我国总体基尼系数^①在1978—1993年虽然历经增减波动,但都在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以下。1994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之后几乎呈现出单边上升的趋势。在2009年之后开始缓慢下降,但仍然高于0.4。从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也能看到,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趋势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的。发展到现在,进入了一个高位徘徊阶段(王天夫,2013)。因此,如何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并促进增长成果共享,即实现共享式增长,已经成为当前发展中不能不面对的关键性问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学者认为在实现共享式增长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财政支出政策(Habito, 2009; 卢现祥等, 2012; 徐俊武, 2013; Anand等, 2014; Seok-Kyun Hur, 2014; ADB, 2014)。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税收分配作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大多数国家,由于无法有效管理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难以真正实施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显著降低了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在税收政策受限的情况下,再分配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支出政策上(Perkins, 2013)。其次,财政支出政策具有重要的分配效应,相对于财政收入政策,财政支出政策更有可能对特定群体产生直接效应,比如,社会转移支付、免费公共服务或享有补贴的公共服务能够直接作用于低收入家庭(Seok-Kyun Hur, 2014)。再次,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财政支出面临增长职能和分配职能的冲突和协调,但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是协调增长与分配关系的关键因素,不同财政支出的合理组合能够促进或者不降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从而实现共享式增长(尹恒等, 2006; 米增渝等, 2012; Gallo和Sagalés, 2013; 史焕平, 2014)。

考察财政支出政策对共享式增长的综合影响,最好是在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统一框架下进行(ADB, 2014)。笔者以财政支出对共享式增长的影响为主题,拟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1)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如何? 共享式增长是否能够实现?
- (2) 我国经济增长在共享程度方面表现如何?

^① 需要指出的是,该基尼系数的计算是基于公开可得的国家统计局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该计算结果不仅低于民间机构的测算,也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但由于以上民间和官方数据都缺少1978年以来的连续时序数据,笔者按照计算数据一致和方法一致的原则,仍然使用该估算数据。笔者认为该结果基本能反映中国收入不平等状况的一般变化趋势,并将在第4章具体讨论基尼系数计算的问题。

(3) 财政支出和共享式增长的理论联系如何? 影响机制如何?

(4) 财政支出在促进共享式增长方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5) 为了最大程度促进共享式增长, 财政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在现有基础上如何进行调整优化?

关于以上问题, 理论界的研究方兴未艾, 政策界的行动如火如荼。笔者试图从财政支出的角度, 对我国经济如何实现共享式增长进行深入研究。

1.1.2 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共享式增长是发展经济学领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经济增长的成果一般会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 逐步惠及所有社会阶层和人群, 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但现实情况是, 尽管发展中国家有较好的增长绩效, 但收入分配却不断恶化, Kuznets“倒U形曲线”的右半部分(即伴随着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得到改善的阶段)似乎遥遥无期。在20世纪50年代, 经济增长自然产生“涓滴效应”的观点就遭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反对。Myrdal(1957)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刚性的经济结构中, 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会更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落后地区。Myrdal的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Chenery(1975)、Ahluwalia(1976)等人的实证检验。发展经济学家们也意识到, 尽管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必要条件, 但并非充分条件, 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应该成为政策的着力点。根据Thorbecke(2014)的总结, 共享式增长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新的范式 and 战略处方(strategic recipe)。在过去60年, 发展的定义以及发展手段在不断演进, 20世纪50年代关注GDP的最大化, 70年代转向就业创造和基本需求的满足, 80年代侧重于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 90年代初期则关注减贫, 到现在, 可持续的、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是重点。

表1.6 共享式增长理念的动态演进

时间	理论焦点	政策理念
50~60年代	经济增长成果能够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 逐步地扩散到社会所有阶层	GDP最大化
70~80年代	关注就业创造和基本需求满足, 后期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稳定	宽基础增长
90年代至2000年	关注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以及提升穷人可行能力的经济政策	益贫式增长
2000年至今	关注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以及降低贫困的增长弹性的作用	共享式增长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整理。

既然共享式增长涉及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成果的共享问题, 理论探讨的